

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成气候资金谈判的关键节点

发达国家应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捐资资金支持目标

□ 本报记者 王卫

11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简称“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随着全球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气候融资特别是发达国家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应对资金成为此次会议各方关注的焦点。

发达国家并未兑现承诺

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被称为“气候融资大会”,其议题之一是建立一个新的年度气候融资目标,以取代目前发达国家承诺的每年提供气候资金的机制。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每年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这个承诺长期没有兑现。

据美国《卫报》报道,呼吁富裕国家政府为新的年度气候融资目标作贡献。对这一数字的预测各不相同,但通常在每年5000亿至1万亿美元之间。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美慈的政策负责人希利表示,气候融资不是慈善或慷慨,而是责任和正义,那些对造成气候危机“贡献”最大的国家必须首先承担责任。

谁是气候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呢?科学研究已证实,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具体来看,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5%;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排放量仍占全球的77%。英国利兹大学等机构去年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全球约90%的过量碳排放源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研究表明,富裕国家因其二氧化碳排放欠发达国家192万亿美元。”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去年6月报道称,英国利兹大学等机构的上述研究发现,富裕国家应当向欠发达国家支付近200万亿美元,以弥补前者排放过量二氧化碳给后者带来的损失。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公共气候适应资金从2021年的220亿美元增至2022年的280亿美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网站11月7日发表的文章显示,这是自《巴黎协定》签订以来最大幅度的绝对及相对同比增长,反映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取得的进展,该协议敦促发达国家在2025年将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资金至少达到190亿美元(2019年水平)的基础上至少翻倍。然而,即使实现“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目标,也只能将适应资金缺口缩小约5%。

阿尔及利亚气候环境问题专家萨比阿·谢里夫表示,在上届大会(COP28)上,发达国家在金融、可持续发



图4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10日,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开幕将至,参观者在会议场馆外参观。 CFP供图

图5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10日,阿塞拜疆巴库,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的入口展示一座“破壳蛋”雕塑。 CFP供图

展和技术等多个领域向发展中国家作出承诺,一些发达国家也部分兑现了承诺,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支持,以加强其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但这种资金支持经常不足和不及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先进技术,以帮助它们过渡到配置可持续能源系统,但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有效获取这些技术。

发展中国家遭“绿色剥削”

“一个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正在将数十亿美元转向富裕国家。”路透社今年5月的一篇报道揭示了一项残酷的事实:在气候补偿问题上,发达国家不仅没有还清其“历史债”,还继续通过贸易机制、贷款附加条件等在气候问题上“绿色剥削”发展中国家。

根据路透社和斯坦福大学新闻项目“重要当地新闻”的调查,从2015年至2020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约353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其中包括1890亿美

元的国家对国家直接支付,这不到1900亿美元。的直接融资中,有一半以上是以贷款而非赠款的形式提供的,这一事实令厄瓜多尔等负债累累的发展中国家感到恼火。它们认为,自己不应为解决主要由发达国家造成的问题而背负更多债务。

路透社等机构的调查显示,中等收入国家获得的气候贷款最多,它们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获得的气候融资中,超过2/3是贷款,而这些国家中,很多国家已经面临着惊人的债务。有气候金融分析师和发展中国家气候官员称,偿还贷款减少了这些国家用于基本社会服务的资金。此外,路透社的调查发现,富裕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中,至少有30亿美元流向了帮助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几乎没有帮助的项目。大量资金流向了燃煤电厂、酒店、巧克力店和其他与气候倡议几乎没有关系的项目。

除了在气候融资问题上不負責任,发达国家还通过贸易机制和规则来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今年6

月发表在英国《自然·可持续发展》杂志上的研究显示,无论是2023年10月欧盟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还是美国正在酝酿中的类似措施,都试图将发展中国家绑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维护发达国家自身既得利益。

今年4月,英国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基恩在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上发文称,欧盟新贸易规则可能使发展中国家陷入10亿美元的“绿色剥削”。欧洲议会通过新规定,要求企业避免和减少其供应链中“侵犯人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这些都是“崇高的目标”,但是如果不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和供应商提供更积极的支持,这些政策使最贫穷国家陷入“绿色剥削”的风险是存在的。已经有报道称,欧盟咖啡进口商正在减少从埃塞俄比亚企业采购,因为他们担心埃塞俄比亚种植者无法达到欧盟的要求。

美国科技巨头各出奇招争相“押宝”人工智能赛道

相关监管政策和立法监管迟缓

□ 本报记者 吴琼

临近2024年年末,人工智能(AI)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根据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亚马逊、微软和Meta近日相继公布的最新一个季度财报,美国科技巨头正在各出奇招,争相布局人工智能赛道,在持续加码投入的同时加大研发力度。

然而,业内人士指出,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同时,美国相关的监管政策和立法却跟进迟缓。如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避人工智能在安全与道德等方面的潜在风险,成为与人工智能发展“齐头并进”的现实挑战。

持续加码人工智能投入

今年以来,字母表、亚马逊、微软和Meta在人工智能投入方面持续加码。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上述大型互联网与软件公司2024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支出将超过2000亿美元。

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报道,近日字母表、亚马逊、微软和Meta相继公布了最新一个季度的财报。除了基本的营收数据外,四家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本支出受到广泛关注。亚马逊2024年在人工智能上的支出将达到创纪录的750亿美元,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将人工智能形容为“真正异常巨大的、或许是千载难逢的机会”。Meta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承诺加大对人工智能语音模型和其他未来项目的投资。有消息称,2024年Meta的人工智能支出可能高达400亿美元。

同时,Meta公司首席财务官苏珊·李预计,2025年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支出还将大幅度增长。

除Meta外,字母表、亚马逊、微软等公司的高管近日也相继表示,明年将会继续“押宝”人工智能赛道,甚至会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甚至放言称“人工智能的黄金时代已然来临”。

《华尔街日报》网站11月1日的文章还称,字母表、亚马逊等大型科技公司近期的财报已表明,它们对人工智能开发数以百亿、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押注开始带来回报。文章也证实,各公司均表示,即将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

瑞银资产管理相关负责人认为,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未来几年关键的增长驱动因素。“我们继续看好半导体、软件和互联网领域的人工智能受益者。”

美国科技巨头争相布局

近年来,美国主要科技公司纷纷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除了持续加码投资额度外,也加大研发力度。这些科技巨头争相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带动了人工智能新一轮爆发式发展。

据报道,今年以来,微软、亚马逊和谷歌等美国

科技巨头正在致力于开发更多面向消费者和企业的的人工智能产品,如谷歌的“双子座”人工智能模型(Gemini)和微软的人工智能助理“智能副驾驶”(Copilot)。

2023年,微软“押宝”OpenAI,随着其聊天机器人ChatGPT月活用户数的增长,微软迅速将相关功能整合到搜索、办公软件等产品中,掀起了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热潮;谷歌全面升级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巴德”(Bard),并进行重大部门重组,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成果强化谷歌智能助手等产品功能;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当年7月成立人工智能公司xAI,并在11月就推出能实时连接社交媒体平台X的首款人工智能模型Grok,给人工智能“淘金热”加了一把火。

另据经济学人智库(EIU)的研究,美国科技巨头已经更大程度地在各自业务中增加人工智能的使用;字母表在其搜索引擎和YouTube中使用了更多的人工智能功能,以此来提高需求和参与度;Meta利用人工智能改进推荐功能,促进广告商的在线销售,并开始通过聊天软件WhatsApp推出商务信息服务;亚马逊也使用了更多的人工智能,为语言助手Alexa增加新的语言学习模型工具,使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体验……

在科技巨头布局人工智能赛道的同时,业内人士纷纷发出警告其中暗藏的风险。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可汗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必须加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各类人工智能的监管,她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已暴露出风险苗头,科技巨头主导地位正在强化,大语言模型训练数据不受审查,存在巨大偏见、隐私泄露等风险。

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首席执行官夏皮罗说:“政府需要在人工智能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确保设置安全屏障和护栏,让业内人士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

OpenAI日前也曾发布其评估人工智能“灾难性风险”的指南,承认“对人工智能灾难性风险的科学研究远远没有达到需要的水平”。由此可见,在美国科技巨头2024年纷纷重仓“押宝”人工智能赛道的背景下,对人工智能各类风险的管控迫在眉睫。

伦理监管风险日益凸显

有专家指出,近年来人工智能爆发式发展,由此引发的伦理、监管等风险和担忧愈加凸显。还有业内人士担心,人工智能算法黑箱和算法偏见将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加剧“信息茧房”现象,使业已极化的美国社会进一步撕裂。

与此同时,在美国,人工智能相关科技公司数据采集过程的合法合规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甚至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已屡见不鲜。2023年12月27日,《纽约时报》就曾起诉OpenAI和微软,指控其未经许可



图为当地时间2024年5月14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山景城举行的谷歌I/O活动上,詹姆斯·马尼卡谈到了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CFP供图

使用该数百万篇文章帮助训练人工智能技术,要求停止这种行为并销毁相关数据,这是美国首家媒体机构提起此类诉讼。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法律界人士认为,相较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美国相关的监管政策跟进迟缓,立法进程明显滞后。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迭代迅速、竞争激烈的背景下,监管体系建设迫在眉睫。

实际上,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及潜在风险,美国白宫、国会和一系列联邦机构曾颁布或提出一些政策、法律或计划,如《2020年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案》颁布于2021年1月,旨在强化和协调各联邦机构之间的人工智能研发活动,但上述法规政策显然跟不上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

2023年10月,美国总统拜登也曾签署行政令,为本国人工智能安全制定新标准,要求美国人工智能系统的研发人员与政府分享其安全测试结果及其他关键信息,完善相关标准和测试工具等,但该行政令缺乏强制执行力。

分析人士就此指出,在当下治理框架、管控措施都没有跟上的情况下,由监管和立法机构制定有约束力的法规至关重要,美国各界也呼吁政府和立法机构尽快采取行动。

不过,密尔沃基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项目主任德里克·赖利的一番话道出了很多业内人士深藏的担忧:“(美国)联邦政府行动和立法机构不够快,跟不上(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发生的变革,所以短期内我们不太可能看到有效的监管。”

环球观察

□ 本报记者 赵阳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既带来了技术红利,也引发了隐私保护的巨大挑战。面对日益复杂的数字技术应用,如何在保障社会进步的同时,防止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遭到侵害?

在气候变化和资源消耗日益严峻的今天,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然而,如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平衡个人、社会与自然界的权利?

毋庸置疑,这些新兴权利的出现使人权的内涵得到了显著扩展与丰富,但同时产生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新兴权利如何保障?

就在上个月的25日,以“新兴权利保障:中国与欧洲的视角”为主题的研讨会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来自中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土耳其、瑞典、捷克、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10多个国家的60余位人权领域代表围绕这些当前全球人权领域热点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新兴权利日益被熟悉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变化,以及人的权利意识的不断提升,催生了许多新的权利,也给传统人权赋予了新的数字化内涵。如何保障新兴权利成为全球人权事业发展中的新课题。

新兴权利到底包含哪些内容?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推动人的权利意识不断提升。这些变化催生了许多新的权利,如数字人权、基因权利等,也赋予传统人权新的数字化形态,如数字经济与碳排放、网络空间的言论自由权、劳动者的离线权等。”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这样认为。

作为一名人权领域的专家,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俊岗关注到了近年来人权领域内涵的发展变化。在他看来,新兴权利的出现和被认可,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观念的产物。“当人们对人性尊严作出新的解释和要求时,新的道德诉求就会出现,而人们之所以会对人性尊严作出新的解释和要求,根本上是因为人们对人性尊严提出了更高的期待,而这种更高期待的背后是更高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

在权利话语高度彰显的时代,新兴权利日益被人们所熟悉和行使。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蒋建湘认为,新兴权利概念及其保护方式的多样性,是国际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具体体现。

数字时代带来新挑战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已经大步迈入数字时代。这一变革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生活品质,同时也为人权保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大学国际法教授曼努埃·费尔南德斯·戈麦斯表示,人权标准各有差异,正是由于差异性的存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才需要进行人权对话。“希望未来能进一步加强欧洲各国与中国的人权对话,以促进相互了解,共促人权进步。”

新兴权利保障已成全球人权发展事业新课题

数字技术为公民的政治权利行使提供了新途径。公民不仅可以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了解社会事务的动态,还能够利用社交媒体等平台进行意见表达和政策参与,增强了民主治理的透明度和互动性。

但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既带来了技术红利,也引发了隐私保护的巨大挑战。比如,网络黑客可能会利用技术手段窃取个人敏感信息。一些企业或机构可能会滥用个人数据,进行不正当的商业行为或侵犯个人权益。如何在保障社会进步的同时,防止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遭到侵害?

中国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永和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伦理挑战,如隐私、数据安全和人工智能的道德决策等。人们需要探讨如何在技术进步与人类价值观之间找到平衡,确保技术的使用符合伦理标准。

再以气候权为例,气候变化应对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挑战,也是当今社会最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对人的健康和生存都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更是发展和人权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为避免气候人过度扩张带来的空心化、碎片化和权利发展的基础上负面影响,需要在既有气候诉讼和环境权发展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气候权的概念,符合合法性和相称性原则,明晰所涉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很多国家的民众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欧洲人权法院资深律师托马斯·斯特劳布认为,国际社会对环境权的立法急需与时俱进,各国需采取更多措施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保障人们的生存权、发展权。

国际社会需加强合作

事实上,新兴权利保护带来的全球性挑战难以依靠每个国家单独解决,而是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至今,中欧已持续开展两次数字人权领域高层对话;今年8月,中国和欧盟正式建立数据跨境流动交流机制。这为中欧开展新兴权利保护提供了合作基础。

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博士研究生毛成毅告诉记者,在推动基于人权的气候变化诉讼过程中,国际社会需加强合作与协调,共同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框架和行动计划。同时,加强司法合作和交流,促进各国法律实践和经验分享交流。此外,还需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帮助,提高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水平。

“面对新兴权利对当前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产生挑战,各国应携手合作,以‘人类优先’作为新兴权利的基本理念,以真正多边主义避免全球新兴权利治理失衡,以开放公正凝聚共识,共同为新兴权利保障提供方案。”马怀德在研讨会上呼吁。

同样,国际哲学和国际科学学院院长、克罗地亚达尔大学哲学教授尤雷·佐夫科在发言中多次强调“相互学习”的重要性。他说,应从人权角度开展文明对话,探讨如何保护人类和人类生存条件,避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危险。

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大学国际法教授曼努埃·费尔南德斯·戈麦斯表示,人权标准各有差异,正是由于差异性的存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才需要进行人权对话。“希望未来能进一步加强欧洲各国与中国的人权对话,以促进相互了解,共促人权进步。”